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 著

安佳 张涵 译

JÁNOS KORNAI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 著

安佳 张涵 译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匈)科尔奈(Kornai, J.)著;安佳,张涵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ISBN 978-7-208-11193-6

I. ①思… II. ①科… ②安… ③张… III. ①科尔奈(F.)-自传 IV. ①K835.1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556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匈]雅诺什·科尔奈 著

安佳 张涵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3.25 插页 4 字数 508,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93-6/F·2154

定价 88.00 元

出版说明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思想传记。在这本思想传记中，科尔奈教授结合自己在匈牙利的亲身经历和社会生活，叙述了他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为他的经济思想发展提供了社会政治背景。

科尔奈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变体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透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端，提出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剖析了长期短缺经济的现象、起因和影响；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关系等，涵盖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实证地讨论了这一体制运转时具备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些研究对中国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中国的专家学者更好地研究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参照系。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背景，科尔奈经历了由对马克思主义盲目而狂热的信仰，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反省，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演变过程。他在一些方面错误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活力也缺乏正确的认识。科尔奈不少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于，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其研究“都是以匈牙利为案例进行的”，是“基于匈牙利的经验”的研究结果。相信读者能用正确的观点解读本书。

2013年5月

《思想的力量》序

对中国改革来说,若要问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最值得铭记,那无疑非雅诺什·科尔奈莫属了。就在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大灾难中脱身出来,已经认识到必须改革,却对改革什么和如何改革还茫无头绪,只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去探路的时候,科尔奈在1980年出版了奠定他经济学学术地位的力作《短缺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对集中计划经济及其变体“市场社会主义”^[1]所做的深刻分析,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震动。1986年《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一问世,就在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掀起了“科尔奈热”。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短缺经济”、“扩张冲动”、“父爱主义”、“投资饥渴”、“软预算约束”等概念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儿。这本书也成为在中国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主要的参考文献。

继《短缺经济学》中文版在1986年正式出版以后,他的其他重要著作的中文版也陆续出版。^[2]此外,中国读者还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3]科尔奈本人在应邀参加“巴山轮会议”以后,还多次访问中国。在1999年、2005年的访问中,他不仅介绍了改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还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科尔奈的所有这些著作和言论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

但是,还有一件事堪称美中不足。这就是在我看来科尔奈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即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思想的力量》中文版还没有能够与内地的广大读者见面。

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科尔奈著作是《短缺经济学》。如同我们知道的,科尔奈对这本书并不完全满意,原因是囿于当时匈牙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只好进行“自

我审查”，避开那些涉及苏东关系的苏联基本制度的若干“敏感问题”。

苏东剧变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新的形势下，科尔奈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透彻分析，弥补了《短缺经济学》的不足。

然而，《社会主义体制》虽然向读者全面呈现了科尔奈分析社会主义体制时取得的学术成果，但是它并未回答这样卓越的学术成果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推动科尔奈付出艰辛的努力，不畏艰险地攀登学术的高峰？所以，这本被科尔奈称为“另类自传”的书，不但讲述了他何时发表哪些著述和言论，而且从主观的角度“解释在某时我为何有某种想法，哪些因素影响我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以及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这种求索后面的推动力量，则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对于真知的追求。或如科尔奈在这本自传中所说：“我这一生中，从来不曾为名利奔波，穷尽一生努力追求的，唯有深刻的思想。”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为《思想的力量》繁体字版写的推荐语指出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家应当怎样为真理、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我和科尔奈教授相识相知始于1981年。那年夏天，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EA)在雅典举行“相对价格的圆桌会议”，我被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席于光远教授派去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科尔奈和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经济学会主席恰恰图罗夫(V. R. Khatachurov)院士在短缺的制度根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恰恰图罗夫认为，从长期来看，计划体制下并不存在系统性的短缺。而我认同科尔奈的观点，并以中国为例，说明了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系统性的短缺。会后我们促膝长谈，结成了延续三十多年的友谊。我在与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中受益良多。我想和他接触的人都会与我有共同的感受。通过《思想的力量》的出版发行，更广大的读者，不论是同意科尔奈观点的人还是不同意的人，有望和我们一样，能够分享科尔奈的思想成果。它将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一大幸事。

吴敬琏

2013年2月7日于北京

注 释

- [1] “市场社会主义”是源于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的一种社会思潮,按照它的一位倡导者 W. 布鲁斯的解释,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理想模式,即生产资料属于国家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则。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市场社会主义意味着用“有调节的市场”取代行政指令来配置稀缺资源。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市场社会主义”具有广泛影响。
- [2] 《短缺经济学》(1980),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增长、短缺与效率》(1982),崔之元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科尔奈经济改革理论》,何家成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反均衡论》(1971),刘吉瑞、邱树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转型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2001,和翁笙和合著),裘宗燕译,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992),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肖梦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3] 如《所有制形式与调节机制之间的亲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共同经验》,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 年第 6 期;《〈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十年之后:作者的自我评价》,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年第 5 期;《解读软预算约束》(与 Eric Maskin、Gerard Roland 合著),载《比较》2002 年第 4 辑;《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视角》,载《比较》2003 年第 9 辑;《大转型》,载《比较》2005 年第 17 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于短缺和过剩的市场理论研究》,载《比较》2011 年第 57 辑;《创新与活力: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载《领导者》杂志总第 35—36 期,2010 年 9—10 月,等等。

中文版序言

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作者看来，每一位读者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读者在我心中（我还要加一句：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这一特殊位置最初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而慢慢形成的。1985年，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同行邀请了七位国外经济学家谈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打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谈到改革问题时，仍然常常会提到那次“巴山轮会议”。

不久，我的《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了。在改革之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通常长期存在食品和消费品以及生产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极度短缺。沿着该书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短缺并不是计划制定者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体制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一体制不断再现着短缺经济。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他们可以用我在该书中提出的逻辑，批评官僚集权体制，批评僵化的计划指令体制，并倡导市场化改革。当时，我的所有著作只有这一本拥有众多的中国读者。

此后，我的著作在匈牙利文版或者英文版之后，很少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来我又数次访问中国，所到之处尽是赞赏和欢迎之声。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旅行都是伟大的智识体验（更别提那些文化、艺术和旅游胜地以及美食了，我真的感谢东道主让我享受到了这一切）。在我访问中国各地的时候，无论身处大学校园还是政府办公室，也无论与学生和教师一起还是与政府官员一道，他们

总是一次次对我说：“我是你的学生。”对此我总是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一个以写作和教书为生的人听到这些话，能不深感荣耀和喜悦吗？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知道自己在中国有着可以信赖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关心我的命运，在意我的言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我也关心他们的命运，在意他们的言论。

我非常希望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希望多数读者都能感觉到：他们与作者之间存在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联系。

事实上，中国和匈牙利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有13亿人口，匈牙利的人口却只有1000万，只抵得上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口。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匈牙利的历史则比较短。两国有着不同的传统、习俗乃至不同的文字，种种不同还可以不断续写下去。当然，两国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

中国和匈牙利都熟知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律，我在书中将这种体制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匈牙利是最早对这一体制实施改革的国家。那时候，渴望进行体制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希望看到为匈牙利改革奠定基础的那些理论和实践。1989—1990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匈牙利与其他几个东欧国家一样，加快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与中国的转型过程颇为相似。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读者即将读到的这部传记的背景，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中国读者同样熟悉的历史背景，是他们曾经的生活，也是他们未来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仅是在个人生活之外部环境的发展中，而且是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这种相似性。传记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文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我还是非常肯定，我生命中的这些经历也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熟悉的经历，他们会从我的经验、我的处境以及我的选择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选择。

在我踏上艰难而又激动人心的思想探索之旅时，我还很年轻。此刻，在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是84岁的高龄了，但我依然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从事研究，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指导学生。中国有尊老的传统（在我的祖国匈牙利，也普遍遵守这一传统），因此对读者来说，花一点时间关注一个老人涵盖四分之一三个世纪的经历，或许还是值得的。

我这一生都在历险。有段时期我身处危险之中，命悬一线，当然我也有和平与宁静的日子；有段时期我饱受迫害和威胁，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忧伤；有段时期

我又获得了人们的褒奖和认可；前段时间我还拥有天真的信仰和毫无来由的热情，之后又继以怀疑和失望。当然，在不那么天真、思维更加缜密后，我又形成了新的信念。通过重新学习和不断积累，新的、更可靠的知识取代了不成熟的知识错误的思想意识。

我的生命之舟一会儿荡漾在宁静的水面上，一会儿又跌宕在暴风骤雨中，好几次，船儿几乎就要搁浅，而海上风暴又起。比如说，自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成立那天起，我就在这家重要的国际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直到它关门的最后一天，整整工作了20年。后来，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份教职，使我得以继续我的研究和教学。再度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并非易事，但我愿意尝试。

由于我已经有了定向的指南针，所以尽管在暴风雨中趑趄而行，我仍然可以看清道路。

我不能说自那时以来，我的政治观点一成不变。读者从我的传记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从1953—1957年，我的政治信念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大改变。但我仍然坚持我一贯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原则，这一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原则，深植于时行的政治立场之下，并界定了我的思想范围。当我惊讶地认识到，我盲目信任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情地违背了我的基本道德原则的时候，我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过去我竭力持守并希望将来仍然坚持的是哪些基本价值观呢？

如果有可能进行排序的话，我要把自由的理念和对人权的保护放在首位。在我的第一部专著《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中，我关注的是自主抉择的问题：为什么独断的中央政府要事无巨细地干预一切呢？为什么不给生产企业留下一点必要的独立性呢？如我提及的那样，在我撰写《短缺经济学》的时候，我把这当作狭隘的经济问题而未予考虑。短缺限制了个人抉择的可能性，它迫使人们永远不可能有主观能动性。自那时以来，我总在我的书中强调这样一个意愿：尽可能放宽个人抉择的范围吧。这样，人们就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之间，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雇主之间，在不同的朋友圈子、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自由进行选择。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休戚与共这个概念一直伴我前行。很多事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解释。我很幸运，我出生在一个家境小康的书香门第，不过，我非常同情那些生于社会底层、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人。虽然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我自己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也从未手头拮据，但我至少认真考虑过饥饿和拮据对穷人

意味着什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对人们从困境中崛起需要做什么的看法有了改变，但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为此做点工作。

我一贯重视为祖国效力。在我这本传记的匈牙利文版面世的时候，当代伟大的匈牙利文学家彼得·纳达什说我是“匈牙利爱国者”。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我是一名犹太后裔，我的父兄都在大迫害期间身亡，我的生命也遭遇了危险。许多有同样痛苦经历的人离开了祖国。再后来，移民潮一波接一波，1956年革命失败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内就有2.5%的匈牙利人离开了祖国。几十年后，当柏林墙出现了裂缝，尤其是这堵墙倒塌之后，很多人跑到富裕国家寻求更富足的生活。发达国家为穷国的才智之士提供的大好机会，触发了“人才外流”的大潮。我非常理解那些出国寻求发展的人，但我自己选择的是另外的道路。虽然我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在美国的一流学府哈佛大学执教18年，但这期间我无数次回到匈牙利。我一直保留着匈牙利公民的身份。居住地和法律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个人的认同感至少同样重要。我是匈牙利人，在我为祖国而骄傲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超然于一国国民之上。但我已经摆脱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摆脱了对不同面貌和肤色的人的偏见。我强烈谴责有害的民族主义。我认为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同时又是一名欧洲人、匈牙利人以及犹太人。这是我在生命的播迁中始终坚持的道德原则之一。

尽管经济学领域依然一成不变，但我的经济学思想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希望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演变）。自从对正统意识形态深感失望以来，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健康的怀疑心态。我不会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任何人说出任何话，不管他多么位高权重，我总要问自己，他说的是真话吗？也许他说的是真话，但他说错了吗？如果我在理论上产生了哪怕一点点怀疑，我都会用实践来对照理论，用日常经验而不仅仅是用统计数据来对照理论（这种对照其实也很重要）。这是防范教条式思维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的生活环境和对日常问题的看法已经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改变了多次，但是——我希望别人也同样看到——我的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一直努力坚持我为自己设定的行为规则。最重要的一个律令就是：一个人的言论和文字必须求真。人不能说谎。如果出于什么原因，我无法说出全部事实，那么，虽然我说的是真话，但因为还有部分事实没有说出来，我依然会为此而感到苦恼。读者将会在我的传记中看到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中国和匈牙利惨痛的历史经验曾经衰读了“自我批评”这一概念。在我们这

两个国度，人们会迫于侮辱甚至严酷的身体暴力而违心地进行自我谴责。但不论自我批评怎样被败坏了声誉，我们还是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这不是出于外部的影响，而是出于良心或冷静思考的命令，这样的反省我进行了多次。我努力审视我早年生活中的行为以及指导我行为的思想意识。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会与这些行为和思想意识决裂。这时候，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人们自怜或谨小慎微，这样就有可能保留过去的许多错误观点。如果你照镜子时不把昏暗的灯光拨亮，就只能看到镜中模糊的面影。就像一首美国歌曲唱的那样，当美国青年开始从恶习的噩梦中觉醒，开始摆脱误导人的传统，那么，“让阳光照进来”。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使本书得以摆在中国读者面前的人。我要感谢出版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我还要感谢安佳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我非常激动地期待着来自中国的思想回应。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Imre Kertész".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lightly slanted style.

2011年10月21日于布达佩斯

献给我的母亲——蒙约

前言

即使在我完成这部传记的绝大部分之后，我仍然不能确定我撰写这本传记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我回顾过去？我又想把这些事情说给谁听？

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也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在匈牙利从一党制向民主制转型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一位杂志记者非要采访我，他说：“以后不会有人对这些事情有兴趣的。”所以，我最终接受了这次长时间的传记式采访。这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我希望我现在完成这本传记还不至于太晚。

多年来，我妻子总是敦促我写写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我总是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年中，我才开始着手这项工作。随后的两年中，这本传记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并影响了我的其他研究计划。

我妻子的执著是我撰写这本传记的动力。如果有人问我，这本传记为谁而作，想满足谁的心愿，获得谁的认可，这个人肯定就是茹饶(Zsuzsa)。

我希望我的传记也会让其他人感兴趣，比如我的儿孙们和其他家庭成员，我过去和现在的同事、学生以及读过我的专著和文章的读者们，这些人可不在少数。那些和我有过私交的人，或者以前读过我的文章的人，实际上已经对我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希望你们能把对我的认识与我在传记中描绘的形象结合起来。你们还可以拿评论我作品的几百篇书评文章与我在传记中的自我评价做个比较。在这本传记中，我谈到了我在撰写每部作品时的看法，以及现在我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我很少公开回应对我文章的诸多评论，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与跟我观点不同的人士不期而遇，我才会跟他们进行一番舌战。在我这本传记中，我想按照年代顺序，对我自己的工作进行全面的“评论”。

虽然我的这本传记大致按照年代顺序发展，但本书绝不是一本日记。本书

的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比如某个事件、某部著作,或者我曾经居住过的某个地方。因此,每章的标题都标注了涵盖的时间段。根据主题的需要,章节与章节的时间顺序连成一体,但可能也有重叠。

有些读者或许没有读过我的早期作品,可能只是对我生活过的时代感兴趣。本书并不负有历史学家的任务,所以不会客观而全面地描述和解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对那些想对匈牙利或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后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研究的人来说,相关文献已经汗牛充栋。我个人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并非重要人物。我所谈的都是我亲身参与并影响我生活的社会和历史事件。

对那些对东欧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我的这本传记或许可以作为辅助材料,为他们研究东欧、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研究东欧知识分子当时的两难处境提供一些细节。很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的人,也撰写了各种报告、日记和自传,这些材料也是日后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希望我的传记也能有助于这类研究,成为这种资料。事实上,我还希望我的早期学术著作也能成为这段历史时期的证明,我已经尽可能保持了这些作品的客观性。这本传记也大大丰富了我的学术著作的内容。现在,我努力将一些因为涉及私人生活太多,或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让我详尽阐述自己的观点,因而没能在《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和《社会主义体制》(*The Socialist System*)中得到充分阐述的材料,搜罗在本传记中。本传记的体裁也允许我就若干伦理、政治和科学问题,阐明我自己的观点。当年因为学术著作的主题受到严格限制,不可能把我的一些观点和个人看法塞进文章中。

我花了很多时间考虑这本传记的书名。最初,因为我自己打算理解自己,所以我倾向给传记命名为《理解……》(*Understanding ...*)。我非常想在这本传记中解释一下我在何时因何产生了什么思想,什么因素对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影响,以及后来我的思想发生的变化。我也非常愿意理解那些与我的思想一致或不一致的人的想法,我也愿意理解那些支持我或者对我不屑一顾的人的想法。

“理解”意味着道德认同或至少是道德默认,这不是我心中想要的那种理解。与我之前撰写学术论文一样,我决没有要在这本传记中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也不想评价他人的观点。我只希望对我所经历的事情做些理解。有时候,我们很难发现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动机和争论中的漏洞,很难发现激励人们的内在力量以及各种冲突中公开或隐蔽的原因。评点自己的过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分析他

人的过去显然更为困难。

最终,我选择了别样的书名:《思想的力量》(*By Force of Thought*)。我觉得,这几个字极为有效地概括了这本传记的主题。我毕生为思想而奋斗,从不追求权力与富贵。某些时候,我也能对某些事件的过程产生一些影响,但这绝不是因为我高高在上向他人发号施令的结果,也不是我出大钱买通他人与我合作的结果。如果我曾经对任何人或任何事件产生过影响,那也是在我的谈话或写作中表达出来的思想的结果。

一位读者在读过本书手稿后谈了他的意见:“你太天真了,居然相信辩论、信念或者思想具有影响力。历史事件的真正推动力是利益。”作为一名具有专业素养的社会变革的观察者和分析家,我不会沉溺于幻想,我会针对所观察的结果,尝试探讨各种形成原因,并根据事件的意义对其进行分析。但是,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才是实施行为的人,这些人有能力在不同选择之间做出抉择。能够对这些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价值、原则和观念肯定属于最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千千万万无钱无势的普通百姓的思想和信念,也会对事件的过程产生确定无疑的影响。如果我不相信思想具有力量,那我整个一生的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思想的力量也有其局限性。实际上,这也是这本传记的题中之义:我的思想在何时因何出现了波折,从而引发我对思想的重新思考?他人的思想如何对我产生了影响?我的思路、分析和建议是如何与他人的思路、分析和建议发生碰撞的?思想要持续经受强度测试。无论这种测试能否使我的思想过关,我在每一章都会阐述这个问题。

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我称这本传记“irregular”(非常规),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这本传记在两个方面与大多数传记不同。首先,我在阐述生活事件时,常常会停下来,表达一下我对其中具体情况看法。我的这种做法不重在讲故事,而是要分析具体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环境。我所做的评论,与社会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研究与创造的过程以及科学社会学或其他各门学科都有关联,因此可以视为独立的微型短论。由于这本传记穿插了一系列本质上与传记关联不多的这类微型短论,所以才称为“非常规自传”。

其次,多数传记都要表现传主的私人生活。尽管我在本书中也叙述了一些私人的和个人的东西,但本书基本上是一部思想自传。从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一术语就可以将我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与我的职业活动和公共服务相

关联的友谊及其他人际关系，统统包括在内。

在本传记中，我也数次提及我的家人和家事，但这个给我带来无尽快乐和烦恼的私人生活并没有占据很多篇幅，传记中的描述也远远没有现实生活中那么精彩。不过，本书附带的照片或许能够将这个没能用文字表现的私人生活展现一二。我之所以称本传记为“非常规”，从严格意义来说，也是因为我很少提及我的私人生活。

现在请允许我稍为谈一下本传记的体裁和风格。在过去 50 年中，我撰写的都是分析性文章，分析性文章需要清晰易懂地将自己所理解的内容充分阐述出来。我不太可能突然就成了文人。所以，读者不要期望我能精彩地描绘各种场景，记录谈话；也不要指望我能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朋友的风貌，或者妙笔生辉地让某些紧张场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文学作家都会留下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未经分析的想法。但科学研究者不能这么干。虽然我在撰写传记，但我仍然是一名学者，所以我力图避免在风格和结构以及表达方式上出现歧义。

过去我写书，通常都清楚地知道我在对谁说话，很大程度上这个受众群体决定了我需要阐释什么以及我认定读者已经了解什么。这次撰写这本自传，情况有所不同。我确信这本传记的读者包括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以及生活在东方和西方的人们，其中有上了年纪的，也有年轻人；有匈牙利人，也有外国人。我会尽我所能，让所有的人很轻松地就能明白我在书中讲述的内容。撰写这本传记时，有好几个地方都让我左右为难。我是否应该最大程度地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如果应该，就需要给出详细的定义和限制条件，并且对理论的原初假设条件进行充分阐述。这种写作方法会给那些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带来阅读困难。那么，我是否应该选择一种有过分简化之风险的简单表达方式呢？由于我不是在撰写学术论文，所以我宁可冒后者之风险。对于那些没有阅读过我的学术著作的读者来说，这本传记能让他们对我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有一些了解。对于那些读过我的学术著作的读者来说，这本传记也可能唤起他们的记忆。在这里，我预先向那些嫌我在书中某些地方过于啰嗦的读者表示歉意。

毫无疑问，我自己的回忆是这本传记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我并没有将写作过程当成记忆的检验：我在写作中并不只是依赖自己的思考和感觉，我还尽可能仔细地核对了其他出版物中记载的相关事实。

我手上掌握有很多材料。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我对我的著作尤其是我认